



（第七期）

目 次

文 史 资 料

- 回忆先父朱仙舫.....朱寿楠 (1)
进贤县民间舞蹈概况.....章小牛 (12)
进贤县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简介.....文先国 (17)

名 人 介 绍

- 纺织实业家朱仙舫.....更生 (20)

委 员 风 云 录

- 多彩的晚霞.....梅 轶 罗增玲 (22)
从船工到企业家.....蔡金山 傅冬清 (31)
花炮声声传四方.....张 能 罗增玲 (37)
富路，就在自己脚下.....黎 苏 梅 轶 (41)
岐黄翰墨竞芬芳.....胡天明 周学新 (44)

乡 风 民 俗

- “上梁”的仪式.....胡天明 (49)
白圩地区民间建房上梁习俗.....蔡金山 (52)



1988年10月

委 员 文 苑

- 学书之我见.....周国富 (53)
- 记游二题.....黎 苏 (54)
- 学校诗笺.....樊伯南 (56)
- 哭嫁歌.....聂伟凡 (58)

回忆先父朱仙舫

朱寿楠

先父名叫芹，字仙舫。生于清光绪十三年，丁亥正月十四日——公元1887年2月6日，祖居江西省抚州府临川县长乐乡百源朱村，现属南昌市进贤县长山晏乡，今年（1988年）是先父诞生101周年，逝世20周年。

实业救国 立志学纺织

先父出身寒微，祖父邑秀才，教私塾，兼务农。先父幼聪颖，从父读，应县试，获第三名。其后，科举废止。当时，清朝内忧外患，交相煎迫。外受列强侵略，丧权辱国，内则民不聊生，革命高涨，国弱民穷，岌岌可危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举国上下，群谋救国之道。鉴于日本自1850年，奋发图强，变法维新，历时半个世纪，由弱国变为强国，跻入世界强国之列。此即历史上著名之“明治维新”运动，为世界所称道，于是师外洋，学日本之风，风靡一时，有识之士，纷纷去日本留学，或学科学，或学工业，或学政法，或组织政党，鼓吹革命。20世纪初叶，先父考取官费，留学日本。1907年，远涉重洋，东渡扶桑，进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（后改名为东京工业大学），学纺织。

先父为何选择学纺织？因先父认为我国国弱民贫，其主要原因，在于工农业不发达，我国农业长期以来，停滞在小农业自然经济状态，而现代工业，则几乎是空白。要增强国

民经济实力，必须大力发展工农业，而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，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。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，百年大计，教育为先，教育是立国之本。故先父主张“实业救国”、“教育救国”。因见海关贸易统计数字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，以纺织品为大宗，而以棉织品金额占首位，故立志学纺织，以振兴纺织，解决人民穿衣问题为己任。先父在上海恒丰纱厂任职时，清末著名书法家“清道人”——临川李瑞清先生嘉其志，亲笔书赠一联，联曰“经纶有大道，衣被及万方”，惜此墨宝于文革浩劫中散失。

学以致用 著书立说

1911年，先父学成归国，应原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先生之邀，进上海恒丰纺织新局，历任技师、工程师、厂长等职。先父在职期间，刻苦钻研技术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锐意改进，多有建树。当时，我国纺织技术人才奇缺，乃办纺织技术养成所，公余时间，不辞辛苦，编写讲义，亲自任教，为培养纺织技术人才作出有益贡献。当时，输入之纺织科技书籍，均为英文、日文原版，学者甚感不便。先父有鉴于此，乃决心著书立说。利用业余时间，起早睡晚，经数年之功，著成《理论实用纺织学》前、中、后三编，是为我国首次出版之中文纺织科技书籍。其后，又著有《纺织合理化工作法》、《改良纺织工务方略》等，发行于世。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《万有文库丛书》编著《纺织》上下二册。

振兴实业 首创江西纺织工业久兴纱厂

1919年，北洋政府时期，原江西省长陶家瑶，在上海邀集赣籍政、军、工商界和知名人士，商议在江西创办纺织工厂。于是发起集资一百块银元，组成“久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”。大股东有政界陶家瑶，军界张勋家族，代表为张必亭，

商界有盐业巨子周扶九等。公推陶家璠为董事长。当时，先父在恒丰纱厂任工程师，陶家璠多次到我家寓所敦请先父为久兴纱厂规划二万锭之设计任务。先父以事关振兴江西实业，为家乡出力，义不容辞，故欣然允诺。并亲自赴南昌九江两地选择建厂地点。考察后，全面综合分析，认为九江综合设厂条件，包括买地建厂，交通运输，原料、燃料供应，产品销售，劳力来源，人才招聘，机物料采购，水源、气候等，优于南昌，故决定在九江建厂。

九江厂址，初选在九江地势较高之九华门、花果园一带，但因地皮索价过高，未成。遂改选在官牌夹。此处虽地势较低，需要填高厂基约一公尺左右，方能与南浔铁路路基平齐，但填高后费用，仍比九华门地价，便宜甚多。且运输便利，铁路车皮，可停在厂门口装卸物资；水运船只，可靠在电厂码头附近卸货，每年节约运费。颇为可观。

久兴纱厂机器，选购当时较为先进的美国纱可洛威尔厂（SAEO—LOWELL SHOPS U、S、A），1922年制造出厂之设备。事先某外商洋行，曾向先父推销外国旧纺纱机，并许以价格优惠，佣金优厚，先父不为厚利所动。认为建设纱厂，是造福江西人民的一件大事，不能买旧机器，滥等充数，遗患无穷，故严辞拒绝。久兴纱厂厂房建筑结构，系由上海比利时罗德洋行设计，厂房建筑施工，则由上海陶桂林记营造厂承造。其厂主陶桂林，在建筑业，颇著声誉，故久兴纱厂整个设计工程，包括生产工艺设计，厂房结构设计，建筑工程施工，在当时属于较高水平。经数年之营造筹备，于1922年，久兴建成，安装机器，陆续开工投产，先父任经理，是为赣人自己设计纱厂，自己办厂之始，亦是江西民族纺织工业之开端。

久兴投产后，业务颇为发达，年年均有盈利，所生产的12支16支庐山牌棉纱，投放市场后，畅销省内，供不应求，惜好景不长，由于董事长陶家瑶，官迷心窍，抽走厂里资金去捐官职，致使资金周转困难，先父不齿陶董事长之所为，遂辞职离开久兴纱厂。陶氏抽走资金，引起董事之间磨擦，陶、张两家大股东，互争久兴控制权，张勋的家族推张泌亨驻厂，陶家瑶则派其第四子陶西白驻厂，双方争权夺利，日甚一日，职工无所适从，管理混乱，生产每况愈下，久兴继任经理是原九江商会会长王式如，任职数年，终未能使久兴摆脱困境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向上海银行财团贷款勉强维持开工，而财权则受上行财团控制。与此同时，久兴欠慎昌洋行的纺纱机及原动机价款拖延数年，无力偿付，双方乃涉讼于原九江地方法院，久兴官司失败，不服上诉，1934年，经原江西高等法院裁决，久兴全部财产，归慎昌洋行所有，用以抵偿债务，从此我省最早创办的纺织工厂，遂落入美商慎昌洋行之手，变为外资企业。

辞职久兴 任职申新

1927年，先父辞职久兴，离浔去沪，应上海纱业、面粉业大王，茂新、福新、申新总公司总经理荣宗敬氏之请，进申新纺织总公司出任申新五厂厂长，先父锐意改进，整顿“申五”，短期见效，深得总经理之赞誉，又请先父兼任申新二厂厂长，申新二厂，经过整顿改进，亦卓见成效。1930年，适德商东方纺织厂，因业务不振，有意出售，“申新”购进，更名为申新七厂，荣氏又请先父兼任申新七厂厂长，可见荣氏对先父之器重和信任，先父主管申新二、五、七厂，广揽纺织英才，于是“申新”人才荟萃，极一时之盛，先父平易近人，助人为乐，广育英才，选拔贤能，声誉日起，众

望所归，成为我国第一代纺织专家。

创办玉屏学校 为家乡办实事

1926年，我们全家（包括母亲、姐姐、我和妹妹）离开家乡，迁居上海，与父亲在一起生活，合家团叙，其乐融融，但是先父仍然十分关怀家乡建设和乡民生活情况，每隔两三年，就要回家乡探望一次，为家乡服务，办几件实事，因见我村无一所正规小学，学龄儿童入学困难，虽有私塾，但容纳学生有限，大量学龄儿童无处上学，增加文盲。教育是立国之本，小学教育是基础，先父为了贯彻“教育救国”之初衷，决定从创办小学做起，利用村内“朱氏祠堂”旧址办起一所完全小学，取名“玉屏学校”，纪念先祖父也，开办后，学员逐年增加，除本村学员外，还有邻村学员，到1926年时有学员约200人，老师10人，校工2人，学校经费开支，全部由先父资助。本村学员，一律优待，免收学杂费，外村学员，按规定缴费，困难户学员，减收费或免费。

办玉屏学校，当时利用祠堂，上马快，决策正确，但是随着社会之发展，学员之不断增加，这所小学之教室、教学设备和社会之需要，不能适应，矛盾突出。于是先父决定购地新建校舍，并由小学扩展到中学，新校址，选择在“河里桥”山上，此地离本村约二华里，离公路约一华里，山名“学礼山”，利用地形建筑校舍，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（包括活动场所）。1927年建成，学校正式迁往新址，由小学扩充到中学，共有学生约500余人，老师20余人，校工3人，学校扩建经费，及办学经费，均由先父独力承担，其资金来源主要有二，一是我家每年可收租谷约400余石（司马秤）全部捐给学校，作为办学基金；二是从先父全年劳动收入和投资收入中，汇款资助，主要用于扩建，经费超支，或其他急需用

途。办玉屏学校，群众反映强烈，认为作用大，效果好，比较满意，主要好处是：1、解决农村儿童“入学难”，“升学难”（中学）两大难题；2、减轻农民家庭经济负担；3、普及农村教育，提高新一代农民文化素质；4、有利于农村普及科技推行科学种田，提高单产；5、有利于发展农业多种经营，安排劳动就业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玉屏学校归人民政府接管。

先父一贯热心为家乡服务，除办玉屏学校外，还为本村修桥补路，修建通汽车马路，自公路起至本村止，长约三华里，并经常资助本村贫困户，发谷或发钱，还介绍青年外出学习技术和安排就业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（1959~1962），先父对家乡贫苦，极为关怀，当了解到我乡农业水利失修，农业无后劲，投入少，产出也少，于是主动将兴中纱厂其本人户名之股金定息，每年约二万元（未扣除10%工商界互助金），捐赠给公社，作为兴修水利，发展农业生产之用。捐款由“兴中”直接汇给公社，其后，公社来信说：“国家对农业水利，有专项拨款，公社有资金，不要再资助。”此后，遂中止汇寄。先父还藏有中华书局出版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全套，因束置高阁，未充分利用，殊为可惜，遂捐赠给临川县立中学，以广阅览，而增效用。

创立中国纺织学会

1930年，先父发起组织中国纺织学会，并当选为学会理事长，一直连任到建国时止，长达十九年之久，学会经常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和技术交流，出版学术刊物和纺织书籍，并选择有纺织厂之有名省、市，举行学术年会。此外，还利用学会有利条件，发挥学会人才荟萃之优势，创办业余纺织学校，为提高我国纺织技术水平、学术水平，和培养出一批又一

批的纺织技术人才，作出了有益贡献。鉴于学会无固定活动场所，颇多不便，先父又发起募捐，建成中国纺织学会会所于上海乌鲁木齐北路（现上海市中国纺织工程学会会址），建国后，中国纺织学会，更名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，会址设在北京纺织工业部。

离开“申新”创立“利中”“复兴”两厂

1934年，“久兴”易主，归“慎昌”所有，先父不愿唯一的民族纺织工业落入美商之手，变为外资企业。1935年遂离开“申新”去汉，与汉口商会会长黄文植合作，发起组织“利中纺织股份有限公司”，集资银元四十万元，向慎昌洋行租办原久兴纱厂，并更名为利中纱厂。黄文植任董事长，先父任经理，其后，提拔邱光庭任厂长。“利中”复工后，业务蒸蒸日上，庐山牌棉纱又畅于省内。1936年，汉口第一纱厂，因业务不振停产，于是先父又与黄文植合作，集合赣鄂工商界贺衡夫、祝庸斋、傅南轩、郑国英、周伯泉、周仲骞等，集资一百万银元，组成复兴实业公司，与汉口第一纱厂合营，由“复兴”承办“一纱”，黄文植任董事长，贺衡夫任副董事长。先父任经理，祝庸斋任副经理，先父主持“利中”，“复兴”两个厂，连年获利，经济效益均甚显著。

主持重庆军纺厂 支援抗战军需

1937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，抗战军兴。1938年日军侵占南京，溯长江而上，武汉相继告急，“利中”，“复兴”被迫停工，迁散职工，先父亦转移重庆养伤。当时，军政部重庆纺织厂复工工作，因乏行家主持，进展缓慢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，遂请先父出来主持。先父素来不愿涉足官场，无意仕进。但因纱布是抗战军需必需品，出于爱国之心，不得不勉为其难，答应出任军政部重庆纺织厂少将

厂长职务。重庆军纺厂有两个分厂，一在南岸弹子石，一在小龙坎。该厂机器是没收日本泰安纱厂从汉口拆迁而来，先父主持工作后，冒着严寒酷暑，往来于弹子石、小龙坎之间，亲临现场，督促工作，鼓励全体员工，积极工作，早日复工生产，支援抗战，通过大家协同配合，努力工作，历时一年多，就胜利完成复工任务，正式投产，有力地支援抗战军需需要。不久，先父即辞职，离开军纺厂。

创立兴中纱厂

1945年9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抗战胜利，举国欢腾。9月20日，先父乘民生公司胜利后首航轮“民族”号，由重庆东下至汉口。我同轮偕行，抵汉之日，正巧是中秋佳节，同沦陷区阔别多年之亲友，战后余生，胜利重逢，喜出望外，自不待言。在汉口我们住在复兴实业公司办事处，先父获悉“复兴”及“利中”战后第一手资料后，旋即乘船离汉赴沪，出任原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第16厂厂长。我坐同船在九江下船，实地调查利中纱厂情况。进入厂区，但见利中纱厂满目凄凉，大非昔比。厂房内部空空如也，机器被搬迁一空，车间成为养马之厩，马粪遍地皆是，臭味难闻。整个利中纱厂被国民党陆军某军的一个军械所占用。

利中纱厂机器为何被搬迁一空？经了解，原来战初国军从汉口作战转移时，曾将汉口日商泰安纱厂二万锭纺机，拆迁重庆，成为战时的军政部重庆纺织厂，武汉沦陷时，日本遂将利中纱厂纺纱机，赔偿给泰安纱厂。因此，泰安将利中机器全部拆迁，分批运往汉口，放在汉口第一纱厂仓库。有一部分机器则在运输途中，铁驳被美机炸中，沉于江底，地点在九江上游，约数十华里的高家湾。

我将调查情况报告先父，请与上海慎昌洋行联系，派代

表前往调查。不久，慎昌派代表柯柏来汉，我陪柯柏在汉浔两地实地调查，柯柏返沪汇报后，慎昌决定将残余纺机及原久兴纱厂全部产权，估价出售。先父得讯后，立即与赣沪政界、金融界、工商界人士邱训谦、王建名、马元凯、龚伯循、吴健陶、余建丞、王德舆、陈志恒等集资数十万美元，组成兴中纺织公司，向慎昌购得原久兴纱厂全部产权。兴中初推龚伯循为董事长，旋龚离沪去港，改推先父为董事长兼总经理，邱训谦任副经理，李群化任厂长，我任保全工程师，后调任工务处长兼运转工程师，洪吉安任运转工程师，后改任保全工程师，李祝三任业务处长。

1946年，兴中复工机构组成后，上海方面由龚训谦负责，汉口方面由李群化负责，九江方面由我和洪吉安负责，积极筹备复工。当时主要抓三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在沪聘请保全技术人员和采购机物料；二是将存汉机器运回九江；三是雇请潜水员，打捞高家湾沉机，并积极组织力量，进行整机配套安装。经过几个月之齐心协力，艰苦奋斗，终于配套成八台细纱机，形成3200锭之生产能力，并于中秋节前，生产出第一批20支庐山牌棉纱，供应市场。这样，使职工充满希望，坚定信心，鼓舞斗志。此后，该厂边生产、边安装，到1948年底，有1800锭投入生产。

迎接解放 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

1948年，先父来赣视察，原江西省建设厅厅长蔡孟坚，曾劝说先父将“兴中”迁台湾设厂，先父不为所动。1949年，江南临近解放，先父在沪来函谆谆嘱告九江方面“兴中”负责人，要相信共产党政策，要坚守岗位，一定要保护好工厂，以便迎接解放。是年五月，国民党广西部队撤离九江。市内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，兴中纱厂不得不宣布暂时停

工，并组织护厂队，进行护厂。5月19日，九江治安呈真空状态。当晚，一些无番号的杂牌部队，冒称解放军，欲强行进入厂内，进行接管，并威胁护厂队缴枪。护厂队坚守自卫，不为所迫，及至天明，上街打听，方知昨为来历不明的王公霸部队骚扰，傍晚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，九江解放了。市民和职工举行集合游行，欢庆胜利，越数月，兴中整机完毕，复工生产，并以棉纱数百件，支持当时旧人民币在市面上流通，为支援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。是年12月，“兴中”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公私合营，是为我省最早公私合营企业，并委任肖善荣为公方厂长，李群化为私方副厂长。

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公方厂长有效地主持工作，职工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，使生产得到迅速发展。从此该厂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，并于1966年改为国营九江国棉一厂。建国三十多年来，该厂从1951年开始，到1981年止，共进行过五次较大的技术改造，设备更新、扩建和新建工程，使这个厂发生巨大变化，取得飞跃发展。老厂换新装，焕发了青春，增强了竞争能力，提高了经济效益，下面举几个主要方面的对比数字，以资佐证。

1949年，兴中纱厂有纱锭18000枚；年产棉纱5451.27件；年产值375.28万元；年利润7.95万元。

1986年九江国棉一厂有纱锭77376枚，线锭21496枚，引进气流纺机2000头（尚未投产），75"宽幅自动换梭布机288台（未开齐）；年产棉纱61595.5件，棉布352.9万米；年产值9109万元；利润460.3万元；税金682.9万元。

现在该厂是我省大中型纺织骨干企业，税利超千万元重点厂之一。产品有纯棉、涤棉、棉麻、中长、气流纺等系列支，产品除内销外，还远销香港、日本、美国、西德等18个

国家和地区。自1984年至1986年，为国家创外汇1688.3万美元，成为九江市纺织系统主要出口创汇单位之一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先父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，乃离沪去京就职。先父还被选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，第一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。1953年，先父回江西，自1954年起，历任江西省轻化工业厅第一副厅长，江西省科学工作委员会副主任，江西省参事室参事等职。“文化革命”期间，先父横遭迫害，不幸于1968年7月20日含冤病逝于江西医院，终年81岁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，1980年，落实政策，先父得以平反昭雪，并开追悼会以示怀念。1985年，先父被提名立传，收入《中国名人辞典》及《中国科学家辞典》（第五分册已出版），先父有知，可以含笑长眠矣。

（上接52页）

“招财进宝”；又一面将蒸好的米果饼子抛在地面，许多凑热闹者蜂拥而上，一抢精光，这叫“打发”。上梁以后，房主要给木工师傅发红纸包，一般是银元十元。仪式完成后，房主大摆酒席，来宾和木工们饱餐一顿，皆大欢喜。

这种民间习俗，流传至今。虽涂有迷信色彩，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表明民间对建房十分重视，这是百年大计，造福子孙的大事。

进贤县民间舞蹈概况

·章小牛·

进贤民间舞蹈究竟起源于何时，目前尚无考证。据传，西晋（公元285—317年）年间，有一蛟龙（孽龙精）在鄱阳湖内兴风作浪，大发洪水。顷刻间平地水满三尺，许多村庄、良田被淹没，黎民百姓叫苦不迭。孽龙精不仅将进贤境内的两处低洼处变成了两条长湖（今军山湖、青岚湖），而且还欲将江西变成大海。当时，一名叫许逊（又名许真君）的道人，目睹孽龙精残害百姓的行为，十分气愤，决计惩治孽龙。经过几番激烈的搏斗，许真君终于在我县捉牛岗乡的枣树铺擒拿了孽龙，并用铁链捆绑住，镇压在西山井下（今新建县西山）。从此，进贤风调雨顺，民众安居乐业。为了纪念许真君的恩德，当时各地集镇、村庄都纷纷兴建祠庙（万寿宫）、祠堂，把许真君的塑像敬为福主，奉为神明。并且每年除夕之夜，当地百姓都要制作一批龙灯（主要是板龙灯，在街上或村头游玩。在龙灯前列由二人或四人肩扛一座许真君的雕像，以示驱邪镇妖，兴福除灾。在我县李渡一带也流传着一个金阁老龙的故事。据说在唐代某时期，龙王偶尔违背了玉皇大帝降雨命令，造成风不调、雨不顺，玉皇大帝一气之下把龙王斩成三段。但贫民百姓却认为金阁老龙一生都是“满天星斗”，只有“一颗陨落”，仍是功德无量，顺民忠臣。因此，每逢年节都精制龙灯，敲锣打鼓，燃放鞭

爆，以示纪念。由此可见，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，我们地区就有民间舞蹈活动。人说，有人类就有舞蹈，我县自有人类生息以来，据现有资料考证已有三千多年，照此推理，我县民间舞蹈的起源也许会更早一些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外地文化也不断输入我县，其中也自然包括舞蹈。清朝末年，是我县民间舞蹈活动最活跃的时期。据李渡镇红桥村民间艺人陈文生（九十六岁）讲叙：

“清末年间，每逢腊月三十日晚上和元宵之夜，不管是有钱的人家，还是贫民百姓，家家都要张灯结彩，村村都要举行灯彩活动。”当时，二塘、南台两乡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：

“不玩灯的村不算村，不出灯的人家不是户。”可见，当时我县的民间舞蹈活动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泛。陈文生还讲到：

“清末年间的民间舞蹈不仅活动范围广，而且表演技巧也高。如李渡镇邹家村的‘金阁老龙’，当时就有上千来节，游玩起来声势浩大，气势磅礴，宛如一条巨龙在翻腾飞舞，其场面十分壮观。”我县二塘乡谭津村的“泼蛇灯”就是清末年间由该村文氏两兄弟创始。据当地艺人文相生说：“当时《泼蛇灯》的表演技巧和表演难度都远远超过了现在的表演水平。其中在表演‘上梁’一组动作中，以前的民间艺人可爬到四、五层高的桌椅上去表演，且动作灵活多变，场面十分惊人。”

清末民初年间是我县民间舞蹈交流比较频繁的时期。我县民间艺人在《龙人》的基础上，不仅创造了“泼蛇灯”，而且发展了“茶灯”、“打花棍”、“车盘灯”等数种民间舞蹈。此外，通过广泛的对外交流，学会和引进了“采莲船”、“蚌壳灯”等多种民间舞蹈，丰富了我县的民间舞蹈内容，促进了我县民间舞蹈的发展。

我县的民间舞蹈内容广泛，种类较多，表演形式多样。既有李渡气势浩大的“金阁老龙”，又有温圳柔合武术之功的《双狮舞》；既有二塘别具一格的《泼蛇灯》，又有南台乡土气息浓郁的《茶灯》；既有梅庄表演风趣的《车伕灯》，又有二塘欢快活泼的《打花棍》。还有《跑马灯》、《香火灯》、《蚌壳灯》、《道教舞》等十六个舞种。每逢新春佳节，这众多的民间艺术便活跃在我县各个乡、镇、村，此情此景真是：

“马灯”开路，	“车伕灯”滚滚，
“蚌壳”戏水，	“采莲船”飘行。
脚踩“高跷”，	肩挑“花篮”（灯）
“茶灯”高照，	“腰鼓”齐鸣。
“滚龙”、“板龙”，	“二龙戏珠”，
“花棍”飞舞，	“泼蛇”（灯）翻滚。
“武狮”行威，	“相公”（灯）坐阵，
“香火灯”中，	“道教”（舞）跳神。

“泼蛇灯”是我县较有特色的一种民间舞蹈，它是我县二塘乡潭津村的文氏两兄弟于一八八三年创始的。这种灯彩既有《手摇狮》的灵活多变，翻滚自如的特点，又有《龙灯》善于延伸，扭摆回旋缠绕的特点，表演起来活泼灵巧，是我县民间舞蹈中的一朵奇葩。

《双狮舞》是温圳镇罗家村的一种武术与狮子灯柔合一起表演的民间艺术。据该村艺人罗小高（四十一岁）讲叙，罗家村在温圳一带素有“武术村”之称。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，罗家村人就精通武术，直至一九四九年后，当地艺人才把武术与狮子灯结合起来表演，并经过多次创新提高，使之成为今天具有一定表演技巧和独特风格的民间艺术。